

滇论丛 文化

主编

陈敢

副主编

陈九彬

马旷源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中文化论丛

主 编：陈 敢

副主编：陈九彬

马旷源

云南人民出版社

(滇) 新登字01号

责任编辑：王小燕

封面设计：杨弼蓉

滇中文化论丛

陈敢 主编

陈九彬 马旷源 副主编

云南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昆明市书林街100号)

云南新华印刷二厂印装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2.25 字数：284 000

1993年5月第1版 1993年5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500

ISBN 7-222-01190-0/C·18 定价：8.15元

前 言

《滇中文化论丛》即将面世，编者邀我作序，颇为难。我到楚雄工作才三个多月，情况知之甚少，且“论丛”的文章也未研读过，实无发言资格。为滇中文化研究呐喊计，故序之。

滇，自古就是一块神奇的土地，更是一座令人惊叹的文化宝库。地形和气候的复杂多样，民族和文化的多彩多姿，是举世罕见的。大陆板块的碰撞挤压，高山大海的漫长演替，造成了滇地神奇的自然景观。大陆文化和海洋文化，东方文化和西方文化的交接融会，必定使滇原成为莫测高深的文化迷宫。这就难怪无论是今人还是古人，都被云之南的永久魅力所吸引。

滇如此，何况滇中？这里所谓滇中，指的是楚雄盆地及其周边地区。许多学者到金沙江两岸探寻人类文明的源头，已获许多重大的发现。170万年前，当世界还是一片洪荒的时候，我们的祖先——元谋人，就在滇中大地上擎起第一支文明的火把。几千年前，彝族先民在金沙江南北两岸广阔的地域内创造了十月太阳历。几乎与中原的青铜时代同步，云南大地上也崛起过青铜盛世。其中世界上最早的铜鼓^①是在楚雄万家坝出土的。用梵文砖建成的大姚白塔是中印文化交流源远流长的见证。石羊镇矗立着中国大陆上最大的孔子铜象……。透过浩瀚的汉文和彝文典籍，人们可以窥见滇中高原上演出过无数人间悲喜剧，可以领略滇中各族人民创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伟大力量。

历史、生活和文化，都是奔腾不息的江河水，在任何一个阶段，它是同一条河，但又不是同一的河水。社会主义的春雷，惊醒了滇中高原的千年旧梦。源远流长的民族文化，犹如枯木逢春，焕发出新时代的风采。彝族文化学派，在滇中大地上崛起，引得世人注目；《咪依鲁》的歌声，倾倒了京华士人；“马樱花”方队，在第三届中国艺术节上独领风骚。带有彝州特色的社会主义民族文化将作为一支伟大的创造性的力量，推动滇中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推动楚雄彝州奔向小康盛世。

《滇中文化论丛》的编辑出版，可以为楚雄州文化发展战略提供助力。我谨祝愿这项事业获得成功。

王天玺

1992年6月7日

（作者为中共云南省楚雄州委书记，
国家民委民族问题研究中心研究员）

目 录

滇中文化概述·····	贺光曙 (1)
巫风·楚俗·····	张毓吉 (10)
滇中文化论·····	马旷源 (14)
滇中地区与黄河中上游地区自然环境比较谈·····	童绍玉 (24)
基督教在滇中民族地区的传播与影响·····	黎兴昌 (32)
彝族毕摩文化论·····	左玉堂 (72)
《九隆神话》断想·····	夏 扬 (94)
创世神话与彝族先民的时空观·····	陈九彬 (100)
石崇拜文化论·····	唐楚臣 (117)
论云南回族文化·····	马旷源 (136)
社祭琐议——兼谈社祭祀珍本《普兹楠兹》·····	陶学良 (176)
彝族祭歌琐谈·····	杨继中 (184)
彝剧和彝族戏剧活动试探·····	芮增瑞 (200)
超越混沌——彝族文学的过去与未来·····	陈九彬 (216)
鲁大宗论·····	卜其明 (249)
从《苗族古歌》看苗族文化发展的轨迹·····	李云峰 (263)
古代滇中地区民族文化交融概论·····	邵长京 (286)

论地理环境对中国西南民族服饰文化的影响	···杨正权	(307)
高翥映及其哲学思想初论	·····陈九彬	(320)
李贽在姚安时期的思想辨析	·····卜其明	(339)
滇鬼论	·····马旷源	(353)
后记	·····编 者	(387)

滇中文化概述

贺光曙

就地域而言，滇中主要是金沙江南岸、澜沧江以东、滇池与洱海之间的一片红土地。由这块古老的土地生育而成的文化，我们名之为“滇中文化”。

(一)

滇中文化源远流长。曾经不可一世地独霸地球一亿多年的巨大爬行动物恐龙，其化石就在滇中的禄丰境内发掘出土，这就是驰名世界的“禄丰龙”，距今约8000万年。无独有偶，同样在禄丰县境内，又相继发现了距今约800万年的腊玛古猿。禄丰恐龙和腊玛古猿的发现，不仅奠定了滇中在世界进化史上的突出地位，而且也给这块古老的土地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在此基础上，在这块土地上发现的距今约170万年的“元谋人”遗址，将我国人类历史向上推进了80多万年，从而奠定了这块土地在人类演化史方面的重要意义。

在滇中大量发掘的文物中，随处可见打制的石器，当然这些石器大多比较简单。从石器的形状可以看出，古猿人要采集野生果物，防御各种野兽的攻击，以及捕捉动物，挖掘野生植物根茎充饥，就不自觉地将石头打制成简单粗糙的工具。在元谋人化石出土的地方及其附近，一次就发掘17件旧石器，其原

料为石英石，类型有尖状器和刮削器。其中有代表性的3件刮削器，虽然也比较简单粗糙，但已经进行了第二步加工即磨制。“元谋人”牙齿化石与“北京人”的门齿相比较，基本形状相似，说明二者都是名副其实的人类的祖先：猿人。当然，“元谋猿人”的门齿较之“北京猿人”粗壮，并且石化程度更深，充分说明比“北京人”更原始。

继打制石器的旧石器时代以后，人类的祖先进入了磨制石器的新石器时代。元谋大墩子新石器遗址曾经过两次科学发掘，显示了丰富的文化内涵。从发掘的15座房屋基址来看，大墩子文化可分为早晚期。这些房屋遗址，相似于后来彝族山寨和河谷傣族居住的土掌房。这种房屋基本上是用粘土构建的，用木料较少，构造较简单，留下了古猿穴居的痕迹。遗址内发现了37座墓葬，还有许多陶器、石器、骨器、角器、牙器和蚌器。特别是出土的陶器中有一种鸡形陶壶，整体用夹沙灰陶制成，状如踞蹲的母鸡，壶口即为鸡头，上有两枚圆泥丸代表鸡眼，壶身用点线纹代表鸡的羽毛，形象逼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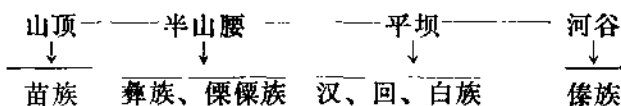
过去考古学界认为，滇中地区从禄丰腊玛古猿“正在形成中的人”到“元谋人”及其旧石器文化，再到大墩子等新石器文化，以及万家坝青铜文化，中间有一个重要的缺环，即从800万年到170万年之间的缺环。近年，经考古学家在元谋县蝴蝶梁子和竹棚地区开展的较大规模的发掘，发现了距今250万年以前的古人类牙齿化石，经科学测定命名为“东方人”；后又在蝴蝶梁子一带发现更早的古人类化石，测定命名为“蝴蝶人”，距今约300至400万年。这一缺环的弥补，充分证明了滇中古文化渊源的悠久性和连续性。

学会用火是“第一次使人支配了一种自然力，从而最后把人从动物界分离出来”。^①在元谋人遗址中，还发现了炭屑，表

明元谋人已经开始用火。火给元谋人带来了光明和温暖，也带来了文明和文化。由于元谋人用火痕迹的发现，将古人类用火的历史提前了100多万年。从钻木取火、击石取火，到火石、火柴的运用，直至现代电子打火机的面世，从一个侧面揭示了人类文明进步的历程。滇中的彝族就是一个“火的民族”，火在彝族文化中占据十分独特的位置。世世代代，彝族人家家每户堂屋中都有一个火塘，冬春借以取暖，长年靠它炒煮食物，白天用火时就点燃，晚上封好作次日火种。这样日复一日，火种不断延续下去。现在的火把节就是彝族人民对火崇拜的体现。在节日里，各村寨火龙飞腾，松香喷撒，彝家儿女尽情地狂欢歌舞，如痴如醉。

(二)

滇中的地理环境对滇中文化的发展影响较大。处于由康藏古陆演变而成的滇中高原的中心地带，全境有两组山脉：北走乌蒙，南亘哀牢；有两条水系：金沙江水系和红河水系。地形由西北向东南倾斜。海拔最高为3657米，最低为556米。立体的地理形势，形成了民族的立体分布，大体为：



平坝地区属于集约型农业，半山区属粗放型农业，山巅属半农半猎型农业。

居住于坝区的汉、回、白等民族，比较注重精耕细作，吸收和采用先进的农业耕作技术。较之山区，坝区交通方便，与外界接触的机会多，因而明显地受外来文化的深刻影响。而山

区、半山区，由于自然条件差，交通不便，形成了自我封闭格局和心态。这里的少数民族长期处于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的状态中，形成了独特的语言文字以及思维方式和价值观念。当然，由于比较险恶的地理环境，使得居住于滇中的各族人民，生存和发展十分艰难，从而造就了滇中文化观念的实用性特征。滇中的历代人民，处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的各种关系，都立足于实用，驰名中外的彝族“十月太阳历”，虽然是一种历法，但最初还是为了占卜。万家坝出土的铜鼓，既作出征时击鸣之用，又作随军的炊具。滇中山区的农舍多为土掌房，这种建筑既适应当地降雨量少的气候，又有冬暖夏凉的居住效果。在唐宋时，彝族先民“土多牛马，无布帛。男子髻髻，女人披发，皆衣牛羊皮”、“其人多深目、长身、黑面、白牙，以锦缠椎髻，短褐、徒跣，戴笠，荷毡、珥、刷牙，金环约臂，背长刀，服弩箭服，腋下佩皮篋，胸至腰索麻索，以便乘马……”^③久而久之，形成了服饰文化的实用性。

滇中文化在地理环境的影响下，显示了十分明显的封闭性特征，但同时又不断受到外来文化的冲击与影响。现有资料表明，周秦以来，中原文化就源源不断进入滇中。庄蹻开滇，为滇中带来了长江中游地区的“楚俗巫风”；汉唐时期，南方丝绸之路把滇中与长安相联系；三国时代，“诸葛南巡”，滇中文化明显受到巴蜀文化的渗透……在长时期的文化交流和发展中，滇中地区与中原地区、滇中少数民族文化与汉文化已经形成了一种不可分割的联系。

明初，滇中地区深受程朱理学的影响，本地的学者均以“四书”、“五经”为本刻苦钻研。如姚安郭如磐卸任归田，下帷讲学，阐扬程朱学派所传之六经，产生了相当的影响。明代中期，王阳明的“心学”成为一时显学，滇中文人也趋之若

鹭，姚州王明凤等人不辞辛苦，专程赴京研习之。明万历五至八年，思想家李贽被贬云南，出任姚安知府。这期间他“务以德化民，不贾世俗能声”，明确提出了“至人之治”的主张，与传统的“君子之治”针锋相对。“至人之治”即“因其政而不易其俗，顺其性而不拂其能”，充分弘扬人的个性。李贽思想在滇中地区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如吕合的丁大训，“李贽每过必访，谈论诗文”。李贽离开姚安时，有弟子郭万民相随不舍。邑人陶珽随李贽学成，先于姚安城东南青莲寺建“李卓吾先生祠堂”，并撰文以记之，后又专寻李贽于浙江麻城。

明末清初，滇中广大地区饱受战乱之苦，不少精英人物不愿再为世俗的功名所累，在佛教思想的影响下回归田园，走向“清心静养”之路。姚安高翥映就是一个重要代表。高翥映生于清顺治四年（1647年），初袭任姚安府土同知世职，又出任四川按察使，但不久便“托疾挂冠”，回乡结庐潜心著述和讲学。高氏一生著述颇丰，据载共有81种。民国年间《姚安县志》称高翥映“凡经史子集，宋元以来先儒学说，与夫诗书文辞，佛藏内典，皆多窥其底蕴而各有心得……皆得扫前人之支离，自辟精义，并于先儒偏驳处时加教正”，从而“清初诸儒，应以顾、黄、颜、王、高并称”。

滇中地区，由于处中国西南门户，所以深受外来宗教文化的影响。南诏时期，印度佛教对滇中地区文化的影响十分广泛。一度时期，各阶层人民对佛教虔诚崇奉。如今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许多佛教名胜。座落在大姚县城西侧的唐代罄锤塔，其造形上粗下细，塔身铭有梵文。武定狮山正续寺，独占地势，融佛、儒、道为一体，并记有明建文皇帝的动人传说。此外，滇中东边的西山华亭寺，西而的宾川鸡足山，都对佛教以及佛学的传播起到重大作用。

在佛教传入并产生广泛影响的基础上，基督教于1905年正式传入滇中地区。传教士有英国的郭秀峰，以及澳大利亚的神父等。他们在这—地区建立了神学院，下设三个总堂：武定洒普山苗族总堂、武定滔谷傈僳族总堂、禄劝县撒老乌彝族总堂。基督教从此在金沙江南岸苗、彝、汉、傈僳族杂居区广为传播。

目前，仅楚雄州，就有基督教、佛教、伊斯兰教三大宗教的信徒4万多人，其中基督教约2万人，主要为彝、汉、苗、傈僳、傣等民族群众；佛教约3000余人；伊斯兰教为18,000多人。

(三)

滇中是少数民族聚居区，因此讨论滇中文化就不能不涉及少数民族文化，而在少数民族文化中，首先又推彝族文化地位显要。彝族原始先民崇拜老虎，崇虎尚黑，形成独特的虎宇宙观。彝族先民的虎宇宙观集中地体现在其史诗《梅葛》中。

《梅葛》认为，天地混沌未分之时，虎尸解体而形成天地，进而演化出万物。与虎宇宙观同时，彝族文化中的虎雌雄观演化而成了阴阳观。在彝族文化中，天文历法占着十分重要的地位。据彝族学者刘尧汉教授考证认为，彝族十月太阳历将一年分为五季十个月，每月36天，全年共360天，余下五天为“过年日”。每三年一闰而合每年366天。彝族的虎宇宙观和雌雄观，内中均以两个神秘的数字为精蕴：36、72。这与现代电子计算机使用的二进位制相似。其哲学思想，既与汉族古代哲人所阐述的道、气、命、阴阳五行学息息相关，又有独特的内涵。

彝族语言属于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由于彝族分布广阔，而形成了各地区语音上的差异性。全国彝族共分东部、南部、西部、北部、中部和东南部六个方言区。滇中一带大体属中部方言区。彝族文字是一种古老的缀音字，史称“爨文”、“𪛗书”和“罗罗文”。现存的爨文约有1万多个单字，其中常用字1,000多个。彝文字呈方块形，无偏旁部首，只有主副笔之分，一般由左至右直行书写；句子多由五个音节组成一句，有韵文体，也有散文体，无标点，仅有分段符号。现存的爨文文献，可上溯到明代的刻本和碑文。在滇中北部禄劝境内发现的爨文碑，是清代有关奴隶买卖、土地房产典卖以及各种借贷事项的契约。马学良先生曾经深入滇中北部武定万德那安和乡土司家，搜集了彝文典籍2000多册，整理而成《保（彝）文经典目录述要》一书，并撰写论文多篇加以介绍研究。1981年，中央民族学院对北京现存的爨文典籍进行了清理。在清理的659部爨文典籍中，就有从滇中地区搜集的514部。

彝族语言文字是靠历代“毕摩”传承的。毕摩是祭司，亦是集宗教和文教为一体的彝族知识分子。他们将民间口头流传的神话聚集起来，采用歌谣形式进行加工整理或者再创作，在各种祭祀活动时演唱。经过不断的积累，这些东西就成了彝族“史诗”。在滇中地区流传的史诗，现已整理出版的有《梅葛》、《查姆》等。这些史诗流传至今，虽然宗教色彩淡化了，但古风犹存，是我们认识彝族历史的“百科全书”。

（四）

滇中文化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于文学创作上。滇中古代文学创作的突出成就，首推彝族史诗《查姆》、《梅葛》、《阿鲁

举热》等。其次是叙事长诗《阿细的先基》、《逃到甜蜜的地方》，抒情长诗《妈妈的女儿》、《我的么表妹》、《哭嫁歌》等。这些作品都是口头相传。另一部分彝族文学作品则保存在用古彝文写成的典籍里，以书面形式流传下来，如《赛玻莫》、《龙王的三个公主》、《月亮银儿子太阳金姑娘》、《雪娥养雀》等。古彝文典籍，没有作者姓名，只有世传毕摩能够学习和传诵。毕摩把彝文传给自己的子孙以及准备从事这一职业的亲属。

明清时期，随着与中原文化交流的加强，主张全面接收中国传统文化滇中文人十分活跃。清嘉靖三年，著名诗人杨升庵被贬谪云南，其间往返滇中20余次，留下大量诗文。杨氏在楚雄结识的知府祝弘舒，给杨以极大的影响。时楚雄县有俞氏兄弟能文能诗。长兄俞经曾“两任西蜀，继升贵阳，坚辞不往”，而以读书创作自娱。其弟俞纬任过知县，“以文章挽风气”。俞经之子俞汝钦，晚年结庐紫溪山，著有《山斋集》；俞纬之子俞汝谐“天资隽拔，学博词宏，长于诗赋”。在姚安，有李暄首以文学著称，著有《传心集》。明万历年间，李贽在姚安任知府时，培育了一代文人陶珽、陶珙弟兄。陶珽曾编《续郭》46卷，辑《四大家文选》和创作诗集《阆园集》。陶珙著有《寄园集》。明万历年间还有楚雄县孙学诗（曾任吏部员外郎）著有《四民图说》，分士、农、工、商四部，章后均缀以歌辞，共24章。吕合丁大训，亦工于诗文，创作颇丰。楚雄崇祯举人陈士恪，“博通经典，助纂通志，长于风雅，题咏甚富”，著有《庸书》、《鸿雪草》等。姜维藩“勤于笔翰，好学不倦”，所著《浪栖草》，“士林传诵。”禄丰的王锡衮，天启二年进士，入翰林院，崇祯十六年掌翰林院事，纂修《玉牒实录》，著有《晋呈御览讲章》三卷，创作《溪适草》

等诗文集十卷。

明清期间文人创作成就最高的，当推楚雄的刘联声和姚安的高翥映。刘联声致力于诗歌创作，为明末清初著名诗人，著有诗集《脉望斋诗草》。高翥映作为学者兼诗人，其文学作品集有《结麟山草》和《妙香国草》。清代著名诗人池春生，15岁便被誉为“五华五子”之一，著有诗集《五华五子诗抄》，以及记述宦海生涯的《入秦日记》、《直庐日记》等。

近现代滇中地区文学创作体裁多样，作品也比较丰富，包括歌谣、传说故事、抒情长诗、叙事长诗、童话、寓言、民间说唱以及传统的诗歌散文等。

滇中这块曾孕育了人类祖先的热土，可谓神奇美丽，多姿多彩。滇中文化也正是从远古走来，带着神秘的色彩，又不断吸收外来文化，呈现出色彩纷呈的状态。现在，滇中文化正参与着世界文化发展的大潮，并以自己独具的风姿，昂首阔步走向未来。

注：

①恩格斯《反杜林论》。

②引自《彝族简史》等。

巫风·楚俗

张毓吉

在生机旺盛的盛夏季节，窗前一株老槐树，枝繁叶茂，象一把大伞遮住骄阳。推窗而坐，清风徐来，使人感到分外凉爽；提笔行文，谈点乡曲，倒也饶有情趣。

乡人谈乡曲，自有一番特别的韵味。单“楚雄”一名的由来，谈者不乏其人，且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个问题的难谈，主要由于地方史料的不足。楚雄地处边隅，古来并不是我国文物之邦。清末咸、同年间，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革命风暴席卷全国，滇西一带，杜文秀、李文学义旗高举，千里哀牢，烽烟滚滚，楚雄城经历了庚申年间血与火的大洗礼。义军与清军在楚雄几度交锋，三进三出楚雄城，城毁人亡，地方史籍，付之一炬。兵燹之余重建楚雄，城址由南向北作了一次大迁移。当年繁华之地的南门坡头，堆着几个小山似的万人冢；金鸡山下，变为狐兔出没之所。因此，要从本地文献中考查楚雄一名的由来，只好待之地下文物之发掘或乞于幸存之碑碣了。

今人说楚雄由来，多据《史记·西南夷列传》中庄蹻开滇的记述。这一简短的记述，并未具体叙述庄蹻是否到了楚雄，泛读来，似乎有点语焉不详。但细读深思，多加考究，还是有可据之处的。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不妨引上几句：“始楚威王时，使将军庄蹻将兵循江上，略巴、黔中以西。庄蹻者，故楚